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兰州大学“敦煌丝路文明与西北民族社会”双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郑炳林 主编

# 三阶教史研究

杨学勇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兰州大学“敦煌丝路文明与西北民族社会”双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项目



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郑炳林 主编

# 三阶教史研究

杨学勇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阶教史研究 / 杨学勇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7. 12  
(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 郑炳林主编)  
ISBN 978-7-5490-1516-0

I. ①三… II. ①杨… III. ①三阶教—佛教史—研究—中国 IV. ①B94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2232号

## 三阶教史研究

杨学勇 | 著

策 划 | 马永强 王 智 郟军涛

项目负责 | 郟军涛

责任编辑 | 房金蓉

装帧设计 | 马吉庆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mailto: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字 数 | 260千

印 张 | 18

版 次 |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8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516-0

定 价 | 64.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 总序

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碰撞、交融、接纳的通道，丝绸之路沿线产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文明，丝绸之路文明是这些文明的总汇。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明珠，它是丝绸之路文明最高水平的体现，敦煌的出现是丝绸之路开通的结果，而丝绸之路的发展结晶又在敦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敦煌学，是一门以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由于敦煌学的外缘和内涵并不清楚，学术界至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否认它的存在。有的学者根据敦煌学研究的进度和现状，将敦煌学分为狭义的敦煌学和广义的敦煌学。所谓狭义的敦煌学也称之为纯粹的敦煌学，即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敦煌石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而广义的敦煌学是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主，包括敦煌汉简，及其相邻地区出土文献，如吐鲁番文书、黑水城出土文书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研究；以敦煌石窟为主，包括河西石窟群、炳灵寺麦积山陇中石窟群、南北石窟为主的陇东石窟群等丝绸之路石窟群，以及关中石窟、龙门、云冈、大足等中原石窟，高昌石窟、龟兹石窟以及中亚印度石窟的石窟艺术与石窟考古研究；敦煌历史地理为主，包括河西西域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以及中古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等。严格意义上说，凡利用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及其相关资料进行的一切学术研究都可以称之为敦煌学研究的范畴。

敦煌学研究是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兴起的一门学科，敦煌文献经斯坦

因、伯希和、奥登堡、大谷探险队等先后劫掠，王道士及敦煌乡绅等人为流散，现分别收藏于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瑞典、丹麦、印度、韩国、美国等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因此作为研究敦煌文献的敦煌学一开始兴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留存中国的敦煌文献除了国家图书馆之外，还有十余省份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收藏有敦煌文献，其次台北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香港也收藏有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具体数量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估计在五万卷号左右。敦煌学的研究随着敦煌文献的流散开始兴起，敦煌学一词随着敦煌学研究开始在学术界使用。

敦煌学的研究一般认为是从甘肃学政叶昌炽开始，这是中国学者的一般看法。而 20 世纪的敦煌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49 年前为敦煌学发展初期，主要是刊布敦煌文献资料；1979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前，敦煌学研究停滞不前；1979 年之后，由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中国学术界有计划地进行敦煌学研究，也是敦煌学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阶段。目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丝路明珠的敦煌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新时期的敦煌学在学术视野、研究内容拓展、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都面临一系列问题，我们将之归纳如下：

第一，敦煌文献资料的刊布和研究稳步进行。目前完成了俄藏、英藏、法藏以及甘肃藏、上博藏、天津艺博藏敦煌文献的刊布，展开了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再一次掀起了敦煌文献研究的热潮，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新进展。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上，郝春文的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辑录校勘工作已经出版了十五册，尽管敦煌学界对其录文格式提出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这是敦煌学界水平最高的校勘，对敦煌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有敦煌经部、史部、子部文献整理和俄藏敦煌文献的整理正在有序进行。专题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也出现成果，如关于敦煌写本解梦书、相书的整理研究，郑炳林、王晶波在黄正建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即将整理完成的还有敦煌占卜文献合集、敦煌类书合集等。文献编目工作有了很大

进展，编撰《海内外所藏敦煌文献联合总目》也有了初步的可能。施萍婷先生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王重民先生目录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内容。荣新江先生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经文献残卷目录（6981—13624）》为进一步编撰联合总目做了基础性工作。在已有可能全面认识藏经洞所藏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学术界对藏经洞性质的讨论也趋于理性和全面，基本上认为它是三界寺的藏书库。特别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逐渐开展起来，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一万余卷，分别收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市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对这些单位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目定名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刊布了敦煌市档案局、甘肃省博物馆藏品，即将刊布的有敦煌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藏品目录，这些成果会对敦煌学研究产生很大推动作用。在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上还有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回鹘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推动了敦煌民族史研究的进展。在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中有很多新成果和新发现，如唐代著名佛经翻译家义净和尚的《西方记》残卷，就收藏在俄藏敦煌文献中，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义净和尚在印度巡礼的情况和遗迹；其次对《张议潮处置凉州进表》拼接复原的研究，证实敦煌文献的残缺不但是在流散中形成的，而且在唐五代的收藏中为修补佛经就已经对其进行分割，这个研究引起了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先生的高度重视。应当说敦煌各类文献的整理研究都有类似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敦煌学论著的出版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试图对敦煌学进行总结性的出版计划正在实施，如2000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百年文库》、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丛书，但都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所以目前还没有一部研究丛书能够反映敦煌学研究的整个进展情况。随着敦煌文献的全部影印刊布和陆续进行的释录工作，将敦煌文献研究与西域出土文献、敦煌汉简、黑水城文献及丝绸之路石窟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敦煌学研究的领域，才能催生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第二，敦煌史地研究成果突出。敦煌文献主要是归义军时期的文献档案，反映当时敦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状况，因此研究敦煌学首先是对敦煌历史特别是归义军历史的研究。前辈学者围绕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工作，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成果很多，如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等。近年来敦煌历史研究围绕着归义军史研究推出了一批显著的研究成果。在政治关系方面有冯培红、荣新江同志关于曹氏归义军族属研究，以往认为曹氏归义军政权是汉族所建，经过他们的详细考证认为曹议金属于敦煌粟特人的后裔，这是目前归义军史研究的最大进展。在敦煌粟特人研究方面，池田温先生认为敦煌地区的粟特人从吐蕃占领之后大部分闯到粟特和回鹘地区，少部分成为寺院的寺户，经过兰州大学各位学者的研究，认为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并没有外迁，还生活在敦煌地区，吐蕃时期属于丝棉部落和行人部落，归义军时期保留有粟特人建立的村庄聚落，祆教赛神非常流行并逐渐成为官府行为，由蕃部落使来集中管理，粟特人与敦煌地区汉族大姓结成婚姻联盟，联合推翻吐蕃统治并建立归义军政权，担任了归义军政权的各级官吏。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归义军职官制度是唐代藩镇缩影，归义军职官制度的研究实际上是唐代藩镇个案研究范例，我们对归义军职官制度的探讨，有益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归义军的妇女和婚姻问题研究交织在一起，归义军政权是在四面六蕃围的情况下建立的一个区域性政权，因此从一开始建立就注意将敦煌各个民族及大姓团结起来，借助的方式就是婚姻关系，婚姻与归义军政治关系密切，处理好婚姻关系归义军政权发展就顺利，反之就衰落。所以，归义军政权不但通过联姻加强了与粟特人的关系，得到了敦煌粟特人的全力支持，而且用多妻制的方式建立了与各个大姓之间的血缘关系，得到他们的扶持。在敦煌区域经济与历史地理研究上，搞清楚了归义军疆域政区演变以及市场外来商品和交换中的等价物，探讨出晚唐五代敦煌是一个国际性的商业都会城市，商品来自于内地及其中亚南亚和东罗马等地，商人以粟特人为主并有印度、波斯等世界各地的商人云集敦煌，货币以金银和丝绸为主，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棉花种植问题，敦煌与高昌气候条件基本相

同，民族成分相近，交往密切，高昌地区从汉代开始种植棉花，但是敦煌到五代时仍没有种植。经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已经开始种植棉花，并将棉花作为政府税收的对象加以征收，证实棉花北传路线进展虽然缓慢但并没有停止。归义军佛教史的研究逐渐展开，目前在归义军政权的佛教关系、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清规戒律、科罚制度、藏经状况、发展特点、民间信仰等方面进行多方研究，出产了一批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和《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四编》中。如果今后归义军史的研究有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佛教等研究点上。

第三，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之为艺术之路，景教艺术因景教而传入，中世纪西方艺术风格随着中亚艺术风格一起传入中国，并影响了中古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汉文化和艺术也流传到西域地区，对西域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如孝道思想和艺术、西王母和伏羲女娲传说和艺术等。通过这条道路，产生于印度的天竺乐和中亚的康国乐、安国乐和新疆地区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音乐舞蹈也传入中国，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由外来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清乐融合而产生的西凉乐，成为中古中国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中国音乐舞蹈的发展。佛教艺术进入中原之后，形成自己的特色又回传到河西、敦煌及西域地区。丝绸之路上石窟众多，佛教艺术各有特色，著名的有麦积山石窟、北石窟、南石窟、大象山石窟、水帘洞石窟、炳灵寺石窟、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文殊山石窟、榆林窟、莫高窟、西千佛洞等。祇教艺术通过粟特人的墓葬石刻表现出来并保留下来，沿着丝绸之路和中原商业城市分布。所以将丝绸之路称之为艺术之路，一点也不为过，更能体现其特色。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研究虽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并没有多大改善，即石窟艺术资料刊布不足，除了敦煌石窟之外，其他石窟艺术资料没有完整系统地刊布，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窟等只有一册图版，北石窟、南石窟、拉梢寺石窟、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等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介绍，所以刊布一个完整系统的

图册是学术界迫切需要。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敦煌石窟在中国石窟和世界石窟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碰撞的结果。在敦煌佛教艺术中有从西域传入的内容和风格，但更丰富的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佛教内容和风格。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很多新的内容，如报恩经经变和报父母恩重经变，以及十王经变图等，是佛教壁画的新增内容。对敦煌石窟进行深入的研究，必将对整个石窟佛教艺术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专家特别是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基本资料的介绍、壁画内容的释读和分类研究等基本研究上，做出很大贡献，成果突出。佛教石窟是由彩塑、壁画和建筑三位一体构成的艺术组合整体，其内容和形式，深受当时、当地的佛教思想、佛教信仰、艺术传统和审美观的影响。过去对壁画内容释读研究较多，但对敦煌石窟整体进行综合研究以及石窟艺术同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还不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套“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比较完整地刊布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完成了第一辑20册。

第四，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学科，研究对象以敦煌文献和敦煌壁画为主。随着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学与相邻研究领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就要求敦煌学将自身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以适应敦煌学发展的需要。从敦煌石窟艺术上看，敦煌学研究对象与中古丝绸之路石窟艺术密切相关，血肉相连。敦煌石窟艺术与中原地区石窟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窟乃至中亚石窟等关系密切。因此敦煌学要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就要和其他石窟艺术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敦煌石窟艺术与中国石窟艺术关系密切，但是研究显然很不平衡，如甘肃地区除了敦煌石窟外，其他石窟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还不够，因此这些石窟的研究前景非常好，只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就会取得很大的突破和成果。2000年以来敦煌学界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集中反映敦煌学界的未来发展趋势，一是石窟艺术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的有力结合，二是敦煌石窟艺术与其他石窟艺术研究的结合。敦煌学研究西域史、中外关系史、中古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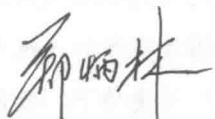
族关系史、唐史研究存在内在联系，因此敦煌学界在研究敦煌学时，在关注敦煌学新的突破性进展的同时，非常关注相邻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如考古学的新发现，近年来考古学界在西安、太原、固原等地发现很多粟特人墓葬，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对研究粟特人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提出了新问题。2004年、2014年两次“粟特人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反映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趋势，敦煌学已经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局面。目前的丝绸之路研究，就是将敦煌学研究沿着丝绸之路推动到古代文明研究的各个领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视野的拓展，而且是研究领域的拓展。

第五，敦煌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得到新发展。敦煌学的发展关键是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早在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初期，老一代敦煌学家季羨林、姜亮夫、唐长孺等就非常注意人才培养问题，在兰州大学和杭州大学举办两期敦煌学讲习班，并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硕士学位点。近年来，敦煌学学科建设得到了充分发展，1998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敦煌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点，1999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共建成教育部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人事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立，这些都是敦煌学人才建设中的突破性发展，特别是兰州大学将敦煌学重点研究列入国家985计划建设平台——敦煌学创新基地得到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和学校的1000万经费支持，将在资料建设和学术研究上以国际研究中心为目标进行重建，为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走向国际创造物质基础。同时国家也在敦煌研究院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经过学术队伍的整合和科研项目带动，敦煌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态势。随着国家资助力度的加大，敦煌学发展的步伐也随之加大。甘肃敦煌学发展逐渐与东部地区研究拉平，部分领域超过东部地区，与国外交流合作不断加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领域逐渐得到拓展。研究生的培养由单一模式向复合型模式过渡，研究生从事领域也由以前的历史文献学逐渐向宗教学、文学、文字学、艺术史等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为国外培养的一批青年敦煌学家也崭露头角，成果显著。我们相信在国家和学校的支持下，敦煌学重点研究基地一定会成为敦煌学的人才培养、学术

研究、信息资料和国际交流中心。在2008年兰州“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年会上，马世长、徐自强提出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石窟研究基地，因各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是这个建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很有前瞻性。当然敦煌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也存在问题，如教材建设就远远跟不上需要，综合培养中缺乏一定的协调。在国家新的“双一流”建设中，敦煌学和民族学牵头的敦煌丝路文明与西北民族社会学科群成功入选，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发展遇到的又一个契机，相信敦煌学在这个机遇中会得到巨大的发展。

第六，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敦煌与吐鲁番、龟兹、于阗、黑水城一样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资料，留下了很多文化遗迹，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丝绸之路文明非常珍贵。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敦煌就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它同河西、罗布泊、昆仑山等因中外交通而名留史籍。汉唐以来敦煌出土简牍、文书，保留下来的石窟和遗迹，是我们研究和揭示古代文明交往的珍贵资料，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丝绸之路上文明交往的轨迹和方式。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敦煌学研究就是丝绸之路文明的研究，而且是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的核心。古代敦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天也必将为“一带一路”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资助出版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囊括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这个群体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个群体经历了很多磨难和洗礼，但仍然是敦煌学研究规模最大的群体，也是敦煌学研究成果最多的群体。目前，敦煌学研究所将研究领域往西域中亚与丝绸之路方面拓展，很多成果也展现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水平。我们将这些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一方面将这个研究群体介绍给学术界，引起学者关注；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督促他们不断进行研究，力争研究出新的成果，使他们成长为敦煌学界的优秀专家。



## 目 录

绪 论 基本问题的说明 .....	001
一、南北朝末期的社会状况 .....	001
二、三阶教基本教义 .....	004
三、研究史回顾 .....	007
四、关于本书 .....	011
第一章 信行及其前期行历(540—589年) .....	015
一、信行 .....	015
二、信行的师承 .....	022
三、信行的前期行历(540—589年) .....	032
第二章 信行后期行历及三阶教状况(589年—隋末) .....	047
一、信行的后期行历(589—594年) .....	047
二、三阶教的内部斗争及隋文帝禁断 .....	052
三、三阶教的信徒(589年—隋末) .....	061
第三章 信行的著作及其相关问题 .....	073
一、信行撰述典籍的情况 .....	073
二、信行撰述的典籍及其相关问题 .....	075
第四章 唐代的三阶教状况(上) .....	123
一、武德至贞观时期的三阶教状况 .....	123

二、高宗至武周时期的三阶教状况 .....	142
<b>第五章 唐代的三阶教状况(下)</b> .....	155
一、中宗至玄宗时期的三阶教状况 .....	155
二、肃宗至唐末的三阶教状况 .....	170
<b>余 论 唐以后的三阶教状况及其性质</b> .....	185
一、唐以后的三阶教状况 .....	185
二、三阶教的性质 .....	191
<b>附 篇 三阶教典籍发现史</b> .....	195
一、历代三阶教典籍目录 .....	195
二、矢吹庆辉发现、介绍三阶教典籍的过程 .....	218
三、矢吹庆辉发现、介绍的三阶教典籍 .....	223
四、1981年发现的唐代金川湾刻经窟 .....	240
五、发现的其他零散三阶教典籍 .....	242
六、2002年西本照真发现、介绍的三阶教典籍 .....	253
七、其他有关典籍 .....	260
<b>参考文献</b> .....	263
<b>后 记</b> .....	275

## 绪论 基本问题的说明

### 一、南北朝末期的社会状况

在下文第一章的论述中，可以知道信行禅师生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年)或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至开皇三年(583年)时已经创立异部，笼统地说则是开皇初创立异部，所以极有必要对这段时间内可能影响信行思想的各种因素做一简介。由于前贤<sup>①</sup>对此段时期的内容有过详细分析，所以此处仅做一简单介绍，以利于了解三阶教兴起的背景。

534年10月，高欢扶持元善见即帝位，此即东魏孝静帝，并于当年把都城从洛阳迁往邺。北魏孝武帝请求宇文泰的保护而逃往长安，后来却被宇文泰毒杀，宇文泰乃立元宝炬即帝位，此即西魏文帝。这样北魏便分裂为东西两魏，分别立邺与长安为都城。东西两魏之间曾有过激烈的拉锯式的战争。550年，高洋(文宣帝)受东魏的禅让，建国北齐；556年，宇文觉受西魏禅让而建国北周。东魏与北齐首都的邺城佛教，由于洛阳佛教文化及僧尼的传播而非常兴盛，尤其

<sup>①</sup> 主要参考[日]鎌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3册，台北：佛光书局，1986年12月)；[日]鎌田茂雄著、佛光出版社译《中国佛教通史》(第4册，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2月)及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5月)。

在北齐文宣帝时素称“十年之中，佛法大盛”<sup>①</sup>，使得北齐朝佛教进入了极盛时代。在佛教界由于昭玄大统法上的活跃，而出现了“大起寺塔，度僧尼满于诸州”<sup>②</sup>的佛教盛世。北齐繁荣的邺都佛教，实际上早在东魏时期就奠定了基础<sup>③</sup>。《魏书·释老志》在总括北魏及东魏的佛教史时说：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舆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sup>④</sup>。

据此知，自北魏取得天下至禅让给北齐(386—550年)，这期间佛经在中国大肆流通，但正光(520—525年)以后，天下战乱不绝，因此征用颇多，很多庶民为逃避纳税或征役而冒充沙门，至此佛教界猥滥已极，弊端重重，而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向北齐延续下去。文宣帝曾建造大量佛寺，如大庄严寺、云门寺等，并非非常重视修行禅观，许多名僧都集聚在邺都，大行讲说佛教教学，因此北朝的佛教主流由北齐所继承。《续高僧传·靖嵩传》载其状况曰：“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寓内英杰，咸归厥邦。”<sup>⑤</sup>天保十年(559年)十月，文宣帝卒，废帝即位，不久孝昭帝即位，561年11月又由武成帝即位，568年12月武成帝卒，由后主掌握大权。武成帝、后主时奉佛衰微，滥造寺院，北齐宫廷佛教颓废已极，已出现末期景象。

① [唐]法琳：《辩正论》(卷3)，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1983年1月，第507页下。

② [唐]法琳：《辩正论》(卷3)，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1983年1月，第507页下。

③ [日]鎌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第3册)，台北：佛光书局，1986年12月，第405页。

④ [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3048页。

⑤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9月，第337页。

与北齐佛教界相比较,西魏和北周的佛教相形见绌了许多。宇文泰促进了西魏佛教的急剧复兴,但若与一度复兴的北齐佛教相比较,则几乎无任何成果可言。但到了宇文护时代,佛教便急剧地趋向兴盛,很多达官贵人热衷于建造佛寺、写经、造像、供养、译经等奉佛行为,并设国三藏、州三藏以处理佛教事务。北周武帝时卫元嵩曾上书灭佛,武帝一时并未采纳,而是多次召开三教论争大会,直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才断然废绝释道二教。《周书·武帝纪》载:“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更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sup>①</sup>,即官私寺院一概彻底灭尽,佛像被破坏,经典被焚烧,敕令僧众还俗为军民,由是大量僧尼逃往深山,北周佛教遭受重创。建德六年(577年)正月,北周平定北齐的邺都,据《佛祖统纪》卷三十八所载“六年,伐齐灭之,并毁齐境佛教经像。时僧尼反服者三百余万”<sup>②</sup>,知武帝在平定北齐后,在北齐境内也施行了破佛举动。宣政元年(578年)六月,武帝崩,随之激烈的毁佛行动亦渐趋尾声,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宣帝敕令准许旧沙门和道士各自专念行道,复兴佛道二教。但直到隋开皇年间,佛教复兴的态势才真正出现,以前逃往山野的僧尼,又重新集合在长安,带来了隋唐佛教的繁荣。

南北朝时,诸学派纷纷兴起与发展,出现了涅槃学派、成实学派、毗昙学派、地论学派及摄论学派。南朝宋与齐,盛行涅槃与成实,尤其梁代最为盛行。摄论学派所依经论为无著的《摄大乘论》(真谛译),地论学派则以世亲的《十地经论》为经典依据。由于地论学派对《十地经论》的解释有所差异,遂分成北道派与南道派。此北道、南道之名称,由于相州入洛阳有二道,道宠在北道故称北道派,慧光在南道故称南道派。此两派之对立,始自洛阳迁都于邺,后继续在邺都各自发展。到了唐代华严宗兴起,地论学派被华严宗吸收而灭亡。南北朝时期,虽有学派,但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佛教学者常一人研究多种经

①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11月,第85页。

②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38),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藏》(第49册),台北:新文丰,1983年1月,第358页下。

论,即使最擅长的是《成实论》,也只能说是理解佛学的成实论师而已,而非依据一经一论而成立的宗派,自然也就迥异于隋唐以后成立的宗派<sup>①</sup>。总之,南北朝时期,南朝重义理,讲究理论探讨,北方重宗教实践,对理论研究不像南朝那么有兴趣。从梁武帝积极从事法会与讲学,而文宣帝则尊崇禅师、奖励禅观,即可看出南北佛教的差异。

此外,极有必要简述一下末法思想<sup>②</sup>。末法思想约在十六国北凉时期,首先在河西地区流行,这与大乘佛教经典《涅槃经》在凉州传译以及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涅槃经》的流行与凉州高僧的倡导和传授有关,其末法思想的流行已是北凉佛教的特色之一,并且末法思想的流行已不仅局限于僧侣阶层,在世俗阶层中也颇具影响。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凉州佛教被输入平城,从而形成了以凉州禅僧为主导的佛教僧团,《涅槃经》随之在平城流传。446年,太武帝灭佛,《涅槃经》所预示的末法时代,由灭法运动得到了验证,所以在经历了北凉灭亡和太武帝毁佛后,凉州禅僧集团对于末法是深信不疑的。昙曜译《付法藏传》并开凿云冈五窟可能就受到了末法思想的影响。北朝末期的造像记、写经题跋和僧史记载也充分反映了末法思想的盛行,唐邕刻经、娲皇宫刻经应当也是受到了当时末法思想的影响。而北周武帝灭佛则又进一步加强了僧尼对末法时代的恐慌,认为当世已经处在五浊恶世、正法隐没的末法时代,所以不得不考虑佛教的命运,他们以末法思想为立教基点,依据各自对佛教的理解,以实际行动挽救衰微的佛法。这其中就包括三阶教。

## 二、三阶教基本教义

信行认为现世处在末法时期、众生根机低下,所以三阶教以末法为立教基

<sup>①</sup> [日]鎌田茂雄著、佛光出版社译:《中国佛教通史》(第4册),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年2月,第346页。

<sup>②</sup> 主要参考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第239—245页。